

云贵高原出土汉代铜钟研究

杨 勇

关键词：云贵高原 铜钟 西汉 西南夷 乐钟文化

KEYWORDS: Yungui Plateau Bronze Bell Western Han Yi of Southwest China Musical Bell Culture

ABSTRACT: Bronze bells unearthed from the Yungui Plateau include two types: one with semi-circular suspension loops, and the other, sheep's horn loops. These two types of bell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ubtypes, respectively. Bronze bells with semi-circular suspension loops were invented by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Plains musical bell culture transmitted to the Yungui Plateau through Ba, Shu, and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Sheep's horn-loop bells, originating in eastern Guangxi, were invented by Western Ou peoples through combining local ethnic traditions with Central Plains musical bell culture, then transmitted westward into the Yungui Plateau.

在云贵高原出土的“西南夷”系统青铜器中，铜钟与铜鼓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乐器种类。不过，铜钟因不像铜鼓那样长期流行，汉以后在云贵高原乃至整个中国南方就消失了，故受到的关注较少^[1]。实际上，这些铜钟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很有特色，且经常多件成套发现，与内地编钟情形相似。所以从考古学上就其做专门考察，既可推进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研究，对认识历史上西南夷的礼乐文化、社会生活及其在这些方面与内地的联系也很有价值。

一、铜钟发现概况及类型

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按基本造型不同，可分为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两大类，后者在广西东部、湖南以及越南北部也有不少发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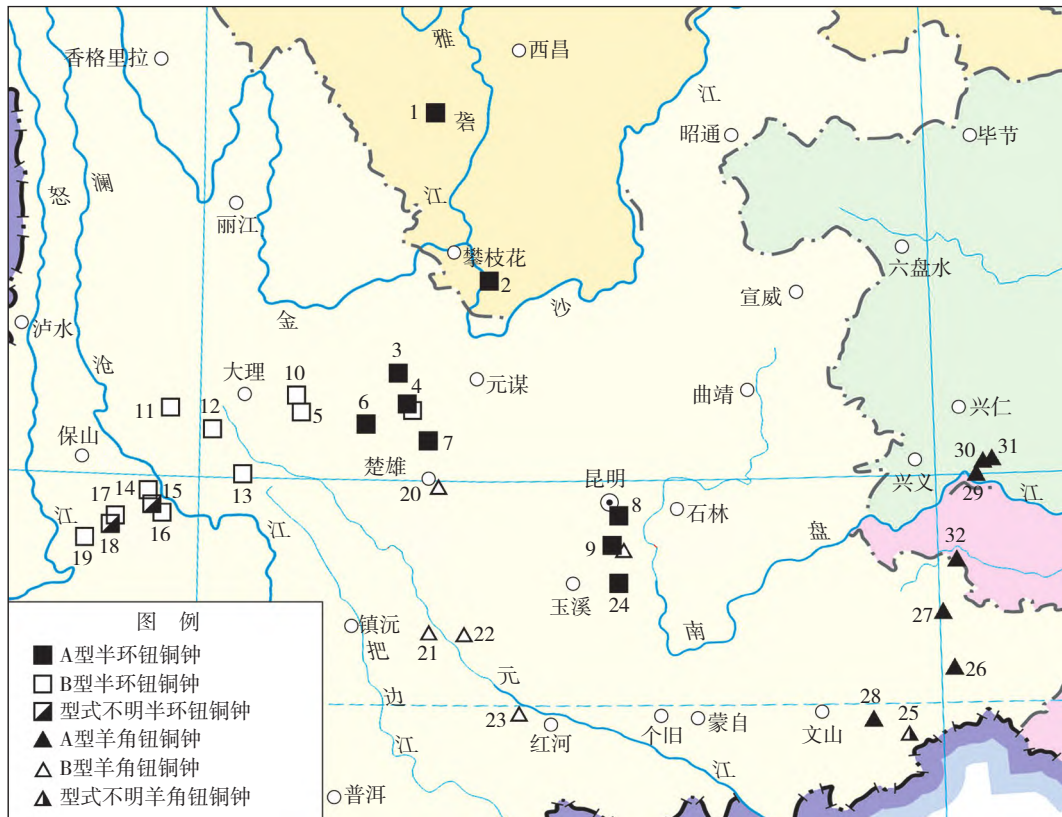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云南出土半环钮

铜钟50件、羊角钮铜钟24件，散布于7个州市的26处地点。贵州出土羊角钮铜钟3件，散布于黔西南安龙县的3处地点。紧邻云贵高原且历史上同属西南夷分布区的川西南及桂西北也有发现。四川盐源老龙头出土半环钮铜钟1件，会理转场坝出土半环钮铜钟6件；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羊角钮铜钟2件（图一）。这些铜钟既有考古发掘品，也有不少为征集所获。后者发现于生产或建设活动，出土地点大多明确，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发掘及调查情况看，铜钟或单件出土，或多件成套出土；有的出自墓葬，有的可能与窖藏等有关。

（一）半环钮铜钟

共57件（表一）。钟顶部有半环状钮，合瓦形腔体显得较浑圆，唇口一般较平。腔面多饰几何纹和动物纹。以通高计，大者四五十厘米，小者20余厘米，个别仅10余厘

作者：杨勇，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一 云贵高原铜钟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1.老龙头 2.转场坝 3.火烧地 4.新街小学 5.大波那 6.小苴 7.福土龙 8.羊甫头 9.石寨山 10.检村 11.永平境内 12.母古鲁 13.王家 14.打卦坟山 15.大横山 16.丫口子 17.烂坝寨 18.团山腰 19.狐狸洞凹 20.万家坝 21.曼蚌 22.西尼 23.牛街 24.李家山 25.新堡寨 26.牡宜 27.小尖山 28.西畴境内 29.木科 30.文家屋基 31.文昌宫旧址 32.普驮 (底本引自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中国地图,并做裁剪、加工,审图号:GS〔2021〕5448号)

米。根据细部形制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 33件。钮较矮,近半圆形,腔体上丰下杀,一般有明显的圆肩,唇口呈橄榄形。见于云南昆明羊甫头^[3]、晋宁石寨山^[4](图二, 2)、江川李家山^[5](图二, 1)、牟定福土龙^[6](图二, 4)、大姚火烧地^[7]、姚安新街小学^[8]和小苴^[9],四川盐源老龙头^[10](图二, 3)、会理转场坝^[11](图三)。

B型: 16件。器形整体较A型略小。钮一般较高,近半椭圆形或倒“V”形,腔体多较圆鼓,肩部不明显,有的接近上下同宽甚至下部略宽,唇口亦呈橄榄形,一般较宽。见于云南祥云大波那^[12]和检村^[13](图四, 1)、姚安新街小学^[14]、巍山母古鲁^[15]、南

涧王家^[16]、昌宁打卦坟山^[17]和烂坝寨^[18](图四, 2)、施甸狐狸洞凹^[19]、凤庆丫口子^[20](图四, 3)、永平县^[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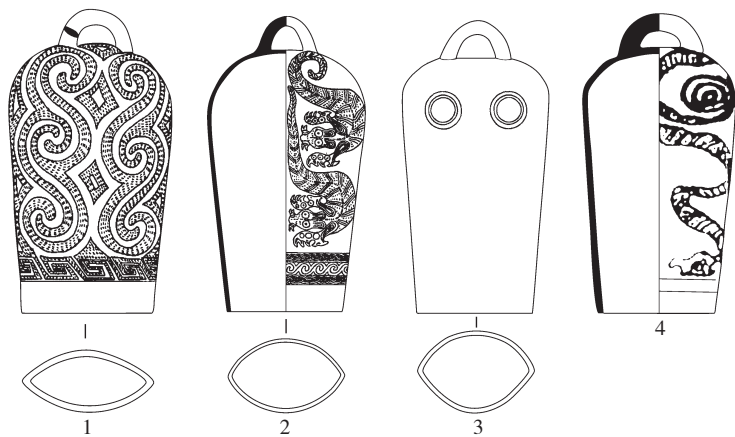
1996年昌宁团山腰出土2件铜钟^[22],钮残,从整体器形看为半环钮铜钟。1964年昌宁大横山出土6件铜钟,已遗失^[23],根据昌宁及邻近地区历年发现的铜钟推测,亦很可能为半环钮铜钟。

(二) 羊角钮铜钟

共29件(表二)。钟顶部两侧歧出对称的羊角状鏊钮^[24],故也被称为“鏊钟”^[25]。腔体亦为合瓦形,但上窄下宽,颇似半截橄榄或半个椭圆体,近顶部有对穿的竖长方形孔,唇口一般较平,呈宽橄榄形。腔面常饰

表一 云贵高原出土半环钮铜钟

地点	数量(件)	型式	出土情况	腔面纹饰	通高(厘米)
江川李家山	6	A	1991~1992年M51出土,成列摆放	饰蟠螭状勾连纹、云雷纹	40.6~50.2
晋宁石寨山	6	A	1956~1957年M6出土,排成两列,每列3件	饰蜿蜒龙纹、弦纹、勾连涡纹、编绳纹	29~40.3
昆明羊甫头	1	A	1998年墓地发掘前后有关部门收缴	饰蟠螭状勾连纹、云雷纹	33.2
牟定福土龙	6	A	1978年村民挖出,依次排列,同出残铜鼓1件	饰蟠螭状勾连纹、涡纹、弦纹、锯齿纹	43~53
姚安小苴	1	A	不详	较模糊,似动物纹	不详
姚安新街小学	4	A、B型各2件	1993年村民挖出,依次排列,同出青铜工具、兵器等,推测出自墓葬	A型素面,B型饰同心圆纹、云雷纹	A型44.5、40.7, B型均为26.7
大姚火烧地	2	A	1989年村民挖出,2件紧挨	大的饰贝纹、蟠螭纹、云雷纹、三角纹,小的饰弦纹	17、53
祥云大波那	1	B	1964年M1出土	钮饰“人”字形辫索纹,腔体饰蛇形雷纹、弦纹、卷云纹	48
祥云检村	3	B	1977年M1西侧石坑出土	饰二虎相斗、两鹤相争、弦纹、卷云纹	一件30.2,其余不详
南涧王家	1	B	1983年村民挖出	饰蛇形涡纹、云雷纹、牛首	45
巍山母古鲁	2	B	2005年村民挖出,同出铜剑、矛、牛模型、杯等,推测出自窖藏	饰双虎食人、鹤、燕、弦纹、卷云纹、云雷纹	28
永平县	1	B	征集,现藏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	饰宽带云雷纹、飞鹰、云雷纹	24
昌宁打卦坟山	4	B	1993年村民挖出	最大一件饰云雷纹,第二件饰“S”形涡纹、牛首、弦纹,第三件饰二虎相斗、牛首、云雷纹,最小的饰二虎相斗、弦纹、斜线	45.5、33.2、30、28(残)
昌宁烂坝寨	1	B	1988年村民挖出	饰蛇纹、浮牛、弦纹	37.8
凤庆丫口子	2	B	2003年村民挖出,小的1件腔体内有穿孔海贝	大的饰“S”形蛇纹、云雷纹,小的饰“父”字形纹、云雷纹	28、33.3
施甸狐狸洞凹	1	B	1986年村民在土坎中发现	饰宽带云雷纹、鼠形动物纹、虎纹	39.9
昌宁团山腰	2	残,不详	1996年村民挖出,同出铜剑、钺、镞等	素面	残高25、26
昌宁大横山	6	遗失,不详	1964年村民挖出,置于铜鼓内	不详	不详
四川 会理转场坝	6	A	1977年养路工人挖出,分三层平铺叠置	饰蟠螭纹、弦纹	43~49.5
盐源老龙头	1	A	1999年M4出土	饰同心圆纹	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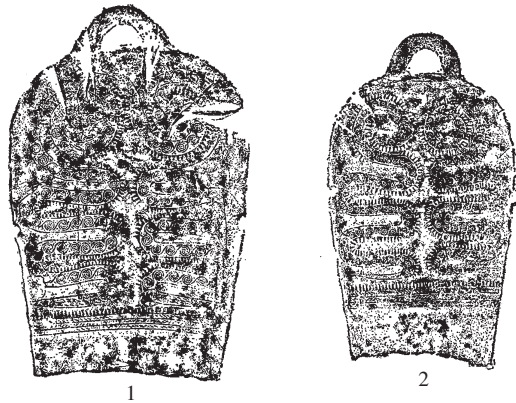


图二 A型半环钮铜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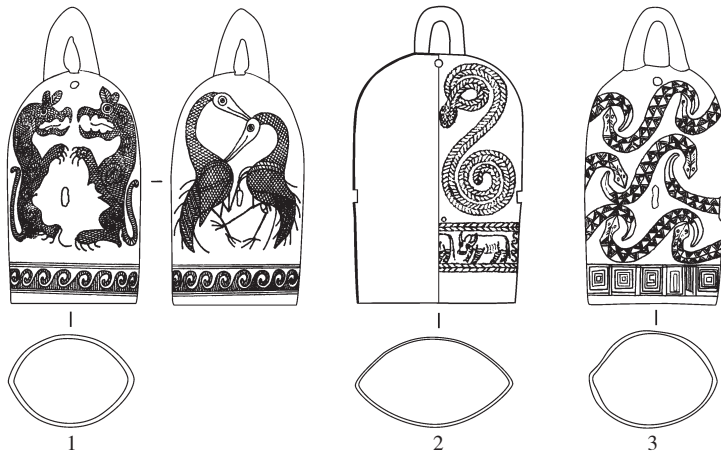
1.李家山M51:269 2.石寨山M6:116 3.老龙头M4:12 4.福土龙出土

牛、牛头、人面等纹饰,也有素面者。尺寸整体小于半环钮铜钟,通高一般20余厘米,少数为30余厘米,个别为10余厘米。根据细部形制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11件。羊角钮较细长,两钮间隔也略宽。见于云南广南牡宜^[26]和小尖山^[27]、麻栗坡新堡寨^[28](图五,1)、西畴县^[29](图五,3),贵州安龙木科^[30]、文



图三 A型半环钮铜钟拓本
1.转场坝2号 2.转场坝5号



图四 B型半环钮铜钟
1.检村M1:52 2.烂坝寨出土 3.丫口子出土

昌宫旧址^[31]、文家屋基^[32]，广西西林普驮^[33]（图五，2）。

B型：16件。羊角钮较短小。见于云南楚雄万家坝^[34]（图六，1）、晋宁石寨山^[35]（图六，2）、元江牛街^[36]（图六，4）、新平曼蚌^[37]和西尼^[38]（图六，3）。

麻栗坡新堡寨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中有2件遗失，具体形制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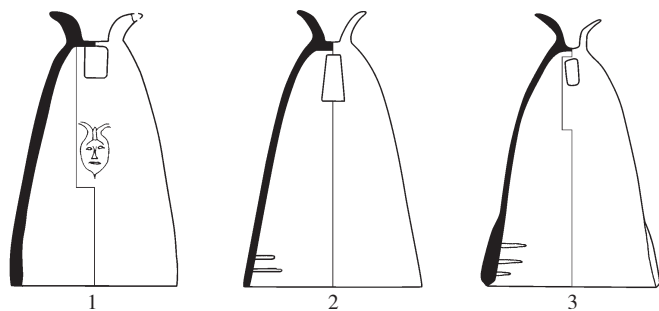
二、铜钟的年代和族属

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有不少是偶然发现的，资料刊布也多不详细，因此很难做细致的年代分析。但部分铜钟为墓葬随葬品，可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物品，墓主身份和地位较清楚，因此可结合墓葬年代来推定铜钟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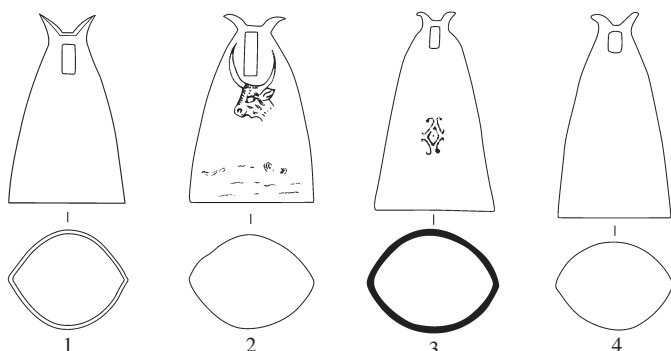
A型半环钮铜钟见于晋宁石寨山M6、江川李家山M51、盐源老龙头M4，B型半环钮铜钟见于祥云大波那M1及检村M1西侧的石坑中。石寨山M6、李家山M51

表二 云贵高原出土羊角钮铜钟

地点	数量(件)	型式	出土情况	腔面纹饰	通高(厘米)	
云南	广南小尖山	1	A	1982~1987年采石时发现	素面	20.3
	广南牡宜	2	A	2011年句町贵族或王族墓出土	外表鎏金,有纹饰不详	不详
	西畴县	1	A	不详	素面	31
	麻栗坡新堡寨	4(2件遗失)	A	2001年村民挖出,相互套叠	1件饰人面纹,另1件腔面有磨痕	饰人面纹者27.7,另一件残高26
	元江牛街	4	B	1989年村民挖出	饰牛、虎	一件24.4,其余皆24
	晋宁石寨山	1	B	1956~1957年M6出土,置于半环钮铜钟旁侧	饰牛头	21
	楚雄万家坝	6	B	1975年M1出土,与铜釜、釜各1件置于腰坑中	素面	15~21.9
	新平曼蚌	1	B	20世纪80年代农民挖出	素面	22.8
	新平西尼	4	B	1987年农民挖出	饰菱格纹	23~23.6
贵州	安龙木科	1	A	1984年工程队修路时发现	素面	37
	安龙文昌宫旧址	1	A	1987年县城南文昌宫旧址出土	素面	29.5
	安龙文家屋基	1	A	2008年修路时发现,同出铜釜、盆、洗、钺等,3件铜钺被羊角钮铜钟套合,推测为窖藏	饰锯齿纹	31
广西	西林普驮	2	A	1972年铜鼓墓出土	素面	28



图五 A型羊角钮铜钟
1.新堡寨出土 2.普驮出土 3.西畴县出土



图六 B型羊角钮铜钟
1.万家坝M1:13 2.石寨山M6:125 3.西尼出土 4.牛街出土

和老龙头M4的年代都为西汉时期。其中，石寨山M6出有“滇王之印”金印，为西汉中晚期某代滇王墓；李家山M51出有铜镜、铁器等汉式器物，年代亦在西汉中晚期。大波那M1为木椁铜棺墓，其年代有一定争议。有学者根据木椁残片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判断墓葬属战国早中期，但也有学者主张应按出土器物特征将之定为西汉时期^[39]，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检村M1为石棺墓，从该墓及石坑出土器物看，笔者认为其亦进入西汉时期^[40]。此外，巍山母古鲁发现的B型半环钮铜钟与剑、矛、杯、牛模型等青铜器同出，这些青铜器与大波那M1所出器物风格非常接近，当多为西汉时期的遗物。

关于羊角钮铜钟的年代，有学者综合各地出土材料分析，认为主要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最早的羊角钮铜钟发现于楚雄万家坝M1，约为战国初期^[41]。还有学者在研究云南出土的羊角钮铜钟时，提出其流行于春秋晚

期至西汉中、晚期，同样以万家坝M1所出者为最早^[42]。另有意见主张羊角钮铜钟流行于西汉中、晚期，万家坝M1的年代亦到不了春秋晚期或战国初，而应在西汉时期^[43]。目前来看，除了万家坝M1，其他出土羊角钮铜钟的墓葬如晋宁石寨山M6、广南牡宜句町贵族或王族墓、西林普驮铜鼓墓以及广西贵县罗泊湾M1，基本都属西汉墓。因此，将西汉时期视为羊角钮铜钟的流行年代，应当问题不大。至于此类钟的出现能否早到战国初期或春秋晚期，则与万家坝M1的断代有关。该问题学界虽有分歧，但一些学者基于出土器物的综合分析和比较，判断该墓已进入西汉纪年^[44]，笔者认为可信的。

综上所述，云贵高原的铜钟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年代相当，基本上是并行发展。关于这些铜钟最早出现的时间，以及半环钮铜钟A、B型和羊角钮铜钟A、B型的年代关系，下文探讨铜钟源流时再进一步分析。

关于空间分布，半环钮铜钟主要发现于云南中、西部和川西南，羊角钮铜钟主要发现于云南元江流域以及滇东南文山州，黔西南和桂西北也有出土。可见，这两类铜钟在空间分布上一类居北、居西，一类居南、居东，虽有少许交错，但大体上泾渭分明。进一步观察，A型半环钮铜钟多见于滇池地区、川西南以及滇西高原东部的龙川江流域，B型半环钮铜钟多见于滇西高原西部的洱海地区以及滇西横断山区，二者明显呈东、西分布，只在滇西高原有些许交错。A型羊角钮铜钟多见于滇东南、桂西北及黔西南一带，B型羊角钮铜钟多见于元江流域，距元江上游不远处的楚雄万家坝、滇池地区

的晋宁石寨山也有出土，二者同样呈东、西分布。

西汉时，以上铜钟分布区域内的族群构成不同。滇池地区是古滇国的中心所在，出土A型半环钮铜钟的石寨山墓地、羊甫头墓地和李家山墓地都属滇文化的重要遗存，石寨山M6埋葬的还是一代滇王。川西南族群关系相对复杂，就出土A型半环钮铜钟的盐源老龙头墓地而言，发掘者推测其族属为笮人^[45]。龙川江流域的A型半环钮铜钟均为偶然发现，该地区以楚雄万家坝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主要与战国秦汉时期的“靡莫之属”有关^[46]。

洱海地区出土B型半环钮铜钟的祥云大波那M1和检村M1，不仅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差异较大，出土器物也有一定区别，当分属不同族群。前者为农耕定居民族，与龙川江流域的“靡莫之属”同类^[47]，后者与较早时期进入该地区并已土著化的氏羌系民族有关^[48]。其他B型半环钮铜钟均非发掘出土，但仍可根据分布及文献记载推断其族属，如滇西横断山区出土的此类型铜钟可能多是汉代生活于此的哀牢夷（也称“永昌濮”）的遗存^[49]。

A型羊角钮铜钟的分布区域大致为汉代句町国的范围。除了广南牡宜发现的句町贵族墓或王族墓，西林普驮铜鼓墓的墓主一般亦认为是句町贵族。

元江流域发现的B型羊角钮铜钟均非发掘出土，族属问题尚难深入讨论，不过整个元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鲜明^[50]，结合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推测很可能与历史上的进桑等族群有关^[51]。出土B型羊角钮铜钟的楚雄万家坝墓地，可能为“靡莫之属”的遗存，但此类型铜钟在龙川江流域并不多见，应非当地族群固有的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万家坝所在的滇西高原地区因临近元江上游（礼社江、马龙河等），其青铜文化与滇东南元江流域有密切



图七 广西宁明高山岩画上的羊角钮铜钟和铜鼓（图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左江岩画》第34页图51，文物出版社，1988年）

联系^[52]。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个别B型羊角钮铜钟显然也非滇文化器物，极可能由元江流域输入。

要之，西汉时云贵高原铜钟的分布有一定规律，族属各不相同。总的来说，使用半环钮铜钟的族群多属濮僚系民族或氏羌系民族。羊角钮铜钟因在广西东部、湖南以及越南北部也有分布，广西左江岩画上亦常见^[53]（图七），所以不难判断，它们主要是“百越”系民族或者是受滨海及岛屿文化影响较多的濮僚系民族的遗物^[54]。

三、铜钟的使用

一些学者根据羊角钮铜钟的出土情况，结合测音结果以及左江岩画资料，对其使用及演奏方法有如下认识^[55]。成套（组）出土的羊角钮铜钟大小有别，音频高低也不同，应是成编演奏的，可归为编钟之列；一般是4件一编，也有2件或6件一编的；演奏时，钟悬挂于“土”字形或“卄”形钟架上，4件一编者分上下两层，左右各一（见图七）。钟的悬挂采用横杆穿过腔体上部长方形孔的方式，使钟在演奏时不易晃动。羊角钮铜钟可以与铜鼓以及半环钮铜钟合奏或杂凑成编，钟鼓组合时能够奏出和谐的二声部乐曲；单个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不少，故推测还

可独奏。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些细节需进一步探究。如钟的悬挂方式，若以横杆直接穿过腔体上部的长方形孔，钟体就会侧面朝向演奏者。故推测并非简单的横穿，横杆上或有其他结构或零件，以保证钟体悬挂后正面朝向演奏者。

对半环钮铜钟的使用和演奏论者很少。从考古发现看，其与羊角钮铜钟应既有共性，又各具特点。共性是都能成编也可单个使用，还常与铜鼓等乐器合奏；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编数以及钟的悬挂方式等方面。

半环钮铜钟经常多件成套出土且大小递减，可知亦能成编演奏。从石寨山和李家山的发现看，此类铜钟多以6件为一编，但也有4件、2件甚至3件一起出土的，说明具体编数并不固定，6件或为完整数。石寨山M6出土的半环钮编钟原有钟架，根据复原，其由一根横梁和两根梁柱构成，铜钟成一排悬挂于横梁下^[56]。此种钟架结构及铜钟挂法不同于羊角钮铜钟，而与楚式编钟相似。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亦为6件一编，可能在组合和音阶设置方面受到了半环钮铜钟的影响。有学者对比了万家坝羊角钮铜钟与祥云大波那及检村半环钮铜钟的测音数据，发现它们的律制和音阶形式大体相同^[57]。

半环钮铜钟也常与铜鼓共出，二者显然可以合奏。有学者形容羊角钮铜钟和早期铜鼓是一对“孪生子”^[58]，其实半环钮铜钟同样可与铜鼓搭配，共同演奏。石寨山M6出土6件半环钮编钟和1件羊角钮铜钟，有学者根据部分测音数据，提出这两类铜钟可杂凑成编的假设^[59]。但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共出的情况极少，另如上文所言，石寨山的这件羊角钮铜钟并非滇文化器物，可能为外部输入品，因此是否存在两类铜钟合编演奏的情形，还不能确定。

半环钮铜钟也有单件出土的情况，故亦可独奏。但这类“独奏”恐与音乐和礼仪关系不大，而只是通过敲击发声来达到某种目

的，如传达信息、召集人员、施行巫术等。在古代南方地区有些铜鼓也是这样使用的。当然，单件使用的铜钟或铜鼓也属重器，并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它们一般由专人掌管，用后常埋于土中密藏。

先秦至汉代，以钟为核心的“钟磬乐悬”一般专供高级贵族享用，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虽然地方特色很浓郁，在编数、律制及具体使用上也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总体而言，其礼仪属性与内地乐钟很接近。从出土铜钟的墓葬看，当时拥有和使用它们的基本为王或部族君长一类的上层人物，其中就包括滇王和句町王。在使用上，这些铜钟亦多成编演奏或与铜鼓等其他乐器合奏，而此类“重型”乐器组合无疑主要出现在祭祀、盟会、宴飨等重大场合。所以，对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来说，铜钟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是乐器，也是象征权力、地位的物品，具有和内地乐钟相似的重要礼仪功能和政治功能。

四、铜钟的源流

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均为合瓦形，又能成编演奏，从形制、演奏方法及社会功能等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与内地乐钟文化有紧密联系，应是在后者的影响下产生的。有学者认为羊角钮铜钟虽很有特色，但仍属中国先秦乐钟体系，是一种地方型乐钟^[60]。笔者认为该意见很有见地，并且同样适用于云贵高原出土的半环钮铜钟，尽管它们的年代一般要晚至西汉时期。当然，根据上文对云贵高原出土铜钟的年代、分布及族属的分析，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在云贵高原的出现应各有其途径和源头。

关于半环钮铜钟，有学者推测是由本地铜铃派生出来的，同时受到了内地带钮的钟、镛、鐃于等乐器的影响^[61]。此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够严谨。从形态看，云贵高原的半环钮铜钟有可能和当地一些铜铃存在

关联,但它并非后者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缘于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这些半环钮铜钟是西南夷吸收内地乐钟文化后,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创造的新的乐钟类型。

从半环钮铜钟的分布以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内地乐钟文化可能主要通过巴蜀及川西高原传播至云贵高原。战国时乐钟文化在巴蜀地区已颇为流行^[62],并辐射至川西高原岷江上游一带。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曾出土数件铜甬钟和铜镛,风格与南方楚、越地区的同类器很相似^[63]。该墓地处岷江上游,等级较高,发掘报告推断其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冉駹有关,年代在战国晚期^[64]。如众所知,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西南夷与巴蜀及川西高原的诸族群曾有密切的往来和联系,有学者甚至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的重要源头,两地族群间存在亲缘关系^[65]。所以可初步判断,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应不晚于战国晚期便开始较多接触内地乐钟文化,并受其影响。可能在战国末至西汉初期,他们开始制作自己的半环钮铜钟。这种铜钟在形式和使用上模仿了内地乐钟,但外形却未摆脱本土文化尤其是铜铃的影响,同时较多采用了本地常见的各种动物纹和几何纹。当然,铜钟形态的设计,与制作技术以及音乐方面的因素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从地理位置看,A型半环钮铜钟或出现稍早,之后向西传播并演化出B型半环钮铜钟。在使用A型半环钮铜钟的族群中,滇的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青铜文化也最发达,在其青铜器上还可看到使用内地镛于的场景^[66],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最早接受内地乐钟文化并制作半环钮铜钟的人群。

关于羊角钮铜钟,不少学者根据出土资料的早晚关系,推断其起源于滇西高原的楚雄万家坝一带,然后向南、向东传播,直至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等地。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首先,如上所述,万家坝墓地的断代

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出土羊角钮铜钟的M1年代可能已进入西汉时期,而非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其次,万家坝并不在羊角钮铜钟的主要分布区域,其所在的滇西高原主要流行半环钮铜钟。再次,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为6件一编,其他地区则多为4件甚至2件一编,这种随传播而变化的现象,也很难解释。综观羊角钮铜钟的年代、分布,以及中国古代乐钟的发展与传布过程,笔者认为,其很可能最先出现在今广西东部,即战国秦汉时期的西瓯故地,后经传播才出现在云贵高原等地。

春秋晚期以后,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不断南进,包括乐钟在内的各种青铜器开始较多出现于岭南。岭南地区发现的先秦甬钟既有中原或楚地直接输入的,也有本地仿制品,后者不仅形制有变化,在装饰等方面亦融入了本地文化因素^[67]。乐钟本土风格的形成表明乐钟文化已逐步为岭南当地族群接纳和吸收。在此背景下,某些族群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创造出更具有地方特色的羊角钮铜钟,应是很自然的事情。广西东部是羊角钮铜钟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而乐钟及乐钟文化进入岭南,最初也主要是沿湘江传至广西东北部^[68],故这一地区最有可能是羊角钮铜钟的发源地。战国秦汉时期,生活于这一带的族群主要是“百越”的一支——西瓯^[69],其势力较强,有“王”或“君长”。随葬羊角钮铜钟的贵县罗泊湾M1,墓主就是南越国册封的西瓯君^[70]。因此,西瓯较可能是羊角钮铜钟的创造者。从现有发现看,羊角钮铜钟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其出现年代可能会稍早一些,但估计不早于战国末。在此之前,乐钟及乐钟文化在岭南已有了一定发展。罗泊湾M1中,与羊角钮铜钟共出的还有铜鼓、铜锣以及直筒形铜钟等乐器^[71]。它们律制相同,有的还带“布”字铭文,可确定为布山(秦和西汉前期桂林郡治所,即今贵县)本地乐器。有学者指出,这套乐器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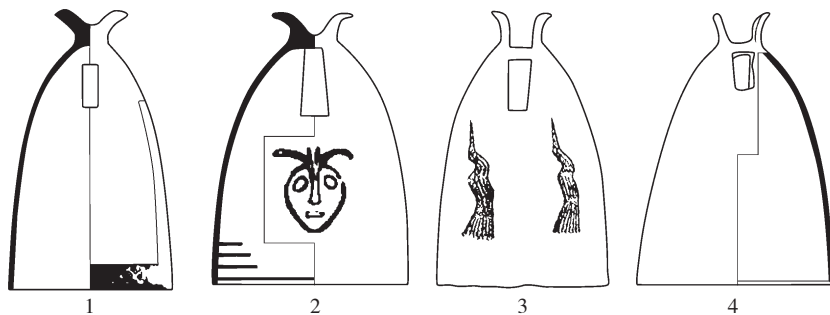
的律制可能是先秦时期广西地区越式钟律制的继承和发展^[72]。这亦表明，羊角钮铜钟不是凭空出现的，此前应有基础。

羊角钮铜钟形制独特，尤其是顶部羊角状“鏊钮”

造型完全有别于内地乐钟的环钮或甬。罗泊湾和麻栗坡新堡寨出土的羊角钮铜钟均见头顶带倒“八”字形发式或头饰的人面纹（见图五，1；图八，2），形状颇似羊角钮铜钟的鏊钮。相似的人物头部造型在左江岩画上也经常见到，或许是当时西瓯、骆越等族群较流行的发式或头饰。因此，羊角钮铜钟的顶部可能就是模仿这种发式或头饰，以此赋予其某种文化或宗教含义。

羊角钮铜钟出现之后，迅速向周邻尤其是西、南方向传播，很快被与西瓯关系密切且习俗相近的句町、骆越等族群吸收，进而又沿元江推进到进桑，乃至滇西高原一带。在此过程中，羊角钮铜钟的细部结构及纹饰有一定的演变，从而形成了一些带有地方风格的新类型，除了前述A、B型，越南北部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也颇具特色，较之其发源地有明显不同（图八）。另外，可能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在编数和律制等方面也显得较为独特。这都反映出羊角钮铜钟的传播主要表现为相关观念和习俗的扩散，而非简单的器物的移动。按照羊角钮铜钟的传播方向，A型的出现年代可能稍早于B型。

关于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有关研究指出，其虽然采用了具有本地特色的音阶结构和律制，但首律及音高标准的选择仍表现出与布山地区律制以及楚、越（岭南之“越”）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73]。这



图八 广西东部和越南北部出土羊角钮铜钟
1.广西浦北大岭脚出土 2.广西贵县罗泊湾M1:37 3.越南兴安出土 4.越南鼎乡B129-2

使得羊角钮铜钟的起源及传播过程更加明确。与其说这类铜钟是滇西万家坝一带的西南夷受楚、越青铜文化特别是越文化的影响而发明，再传播至岭南越地，不如说它们原本就是越地器物，从岭南向云贵高原传播。

进入东汉以后，随着云贵高原西南夷青铜文化的迅速衰落和消亡，作为其一部分的铜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半环钮铜钟还是羊角钮铜钟，之所以没有像铜鼓那样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和流传下去，可能与其制作和演奏更加复杂有很大关系，当然，当地礼乐文化及习俗的变革也应是重要原因。

五、结 语

云贵高原的汉代铜钟是在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方类型；由于地域特色浓郁，它们又是当地西南夷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铜钟包括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两类，二者年代相当，都流行于西汉时期，但分布、族属和源流等各不相同。

半环钮铜钟可分为A、B两型。A型多见于滇池地区、川西南以及滇西高原东部的龙川江流域，B型多见于滇西高原西部的洱海地区以及滇西横断山区，二者在滇西高原的分布有些许交错。使用A型的主要是滇人、笮人以及龙川江流域的“靡莫之属”，使用B

型的主要为哀牢夷以及洱海地区的“靡莫之属”和土著化的氐羌部族。这些族群从族系或族源看，多属濮僚系民族或氐羌系民族。半环钮铜钟是西南夷在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下创造的，其在形式和使用上模仿了内地乐钟，但很多方面又打上了本地文化的烙印。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巴蜀及川西高原一带传播至云贵高原。A型半环钮铜钟出现稍早，后向西传播并发展出B型半环钮铜钟。

羊角钮铜钟亦分A、B两型。A型多见于滇东南、桂西北及黔西南一带，与句町关系密切，B型多见于云南元江流域，使用者可能主要为进桑等族群。羊角钮铜钟还见于广西东部、湖南以及越南北部，说明主要与“百越”系民族或受滨海及岛屿文化影响较多的濮僚系民族有关。此类铜钟最早发源于广西东部，是当地西瓯人在内地输入的乐钟文化影响下，结合本族群文化创造的，之后向西传播进入云贵高原，先后形成A、B两型。所以，羊角钮铜钟不同于半环钮铜钟，其最初并不是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创造的。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不是同类钟中年代最早的，当地也不是此类钟的发源地。羊角钮铜钟出现在楚雄万家坝和晋宁石寨山，主要与文化交流及传播有关。

与内地乐钟相比，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虽有诸多地方特色，但仍不失礼仪属性和功能。在使用上，半环钮铜钟与羊角钮铜钟大体接近，但也有差异，如编数和悬挂方式等。最后要指出的是，这些铜钟的具体演奏方法、律制特征以及制作技术等是可以继续关注 and 探讨的问题。

注 释

[1]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且或偏重于羊角钮铜钟（蒋廷瑜：《羊角钮铜钟初论》，《文物》1984年第5期；黄德荣：《云南羊角编钟初探》，《云南文物》2004年第2期），或只是以概述性的介绍为主（李昆声：《云南艺术史》

第105~10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李纯一：《中国出土上古乐器综论》第276~284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张合荣：《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第157~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2] 蒋廷瑜：《羊角钮铜钟补述》，《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
-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 [4]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6] a.杨玠：《云南牟定出土一套铜编钟》，《文物》1982年第5期。
b.李朝真、段志刚：《彝州考古》第101、10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c.赵璞：《楚雄地区又出土一批古代编钟》，《云南文物》2004年第1期。
- [7] 同[6]c。
- [8] a.施文辉：《云南姚安首次出土一批编钟》，《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b.同[6]c。
- [9] 笔者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参观所见。
- [10]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1] 陶鸣宽：《四川会理出土一组编钟》，《考古》1982年第2期。
- [12]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12期。
- [13] 大理州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
- [14] a.同[8]a。
b.同[6]c。
- [15] 刘喜树、范斌：《巍山发现一批古代青铜器》，《云南文物》2007年第1期。
- [16] 曹德富：《南涧发现古代编钟》，《云南文物》第15期，1984年。
- [17] a.张绍全：《昌宁县第三次出土古代编钟》，《云南文物》第36期，1993年。
b.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第115页，上海古籍出版

- 社, 2017年。下引此书, 版本均同。
- [18] a.张绍全、李智耀:《昌宁再次出土古代编钟》,《云南文物》第25期, 1989年。
b.耿德铭、张绍全:《云南昌宁青铜器综说》,《考古》1992年第5期。
c.《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第103、104页。
- [19] 《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第116页。
- [20] 《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第170页。
- [21]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第92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
- [22] 《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第114页。
- [23] 同[18]b。
- [24] 此类铜钟上的羊角状鏃钮可能并不用于钟的悬挂(详见后文), 也无其他实用功能, 所以严格讲, 称为“羊角钮铜钟”并不合适。但为了避免歧义, 这里仍然按惯例沿用这一名称。
- [25] 李纯一:《中国出土上古乐器综论》第280页, 文物出版社, 1996年。
- [26] 杨帆、何林珊:《云南文山州广南县牡宜句町贵族墓地》, 见《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 2012年。
- [27] 王金光、张祖光:《广南小尖山青铜时代古墓群调查》,《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1987年第5期。
- [28] a.刘波:《人面纹羊角钮编钟》,《云南文物》2002年第2期。
b.刘永剑:《云南麻栗坡出土人面纹羊角钮钟》,《文物》2008年第10期。
- [2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第36、37页,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8年。报告称此件羊角钮铜钟出土地点不详, 通高15.5厘米, 但从插图及图上比例尺看, 该钟尺寸应该增加一倍左右。另据有关资料, 1990年西畴县芦村村出土1件羊角钮铜钟, 通高32厘米(刘德荣等:《新编文山风物志》第169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 可能就是这件铜钟。
- [30] a.胡维屏、李志恩:《我省首次发现羊角钮铜钟》,《贵州文物》1984年第2期。
b.宋世坤:《安龙县木科出土羊角钟》, 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 [31] 宋世坤:《安龙县羊角钮钟》, 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 [32] 李飞:《贵州安龙新出铜器——兼论贵州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
- [33] a.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b.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考古》1982年第2期。
- [34]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 [35]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59年。报告称此件羊角钮铜钟为大铜铃。
- [36] 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第726页, 中华书局, 1993年。
- [37] 黄德荣:《云南羊角编钟初探》,《云南文物》2004年第2期。
- [38]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新平县志》第514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年。
- [39] 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
- [40]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27页, 科学出版社, 2011年。下引此书, 版本均同。
- [41] 蒋廷瑜:《羊角钮铜钟初论》,《文物》1984年第5期。
- [42] 同[37]。
- [43]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第104、105页,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 [44] 除李龙章外, 徐学书亦持相近看法, 参见氏著《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
- [45]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204~210页, 文物出版社, 2009年。
- [46]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54、255页。
- [47] 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考古》1966第1期;《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第4期。

- [48]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28、229页。
- [49] a.同[18]b。
b.杨勇：《滇西横断山区汉代考古发现及研究》，见《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
- [50] 周志清：《浅析云南元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 [51] 进桑是战国秦汉时期滇东南一带的古族，史迹较少，一般认为其地在句町以西，即今元江流域，属濮人。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第50、5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10、11页，中华书局，1987年。
- [52]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59、260页。
- [53] a.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第127、128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
b.王克荣等：《广西左江岩画》第34、82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 [54] 长期以来，关于云贵高原西南夷诸族群的族系和族源讨论很多又莫衷一是。限于篇幅，加上牵涉甚广（包括族群理论以及百濮、百越、氐羌这些族系概念本身的内涵和构成等），本文不展开专门分析，而是结合以往所论做大致推断，意在说明不同类型铜钟与不同系统族群的对应关系。
- [55] a.同[2]。
b.同[37]。
- [56] 汪宁生：《“滇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晋宁石寨山文物研究之一》，见《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 [57] 吴钊等：《万家坝、石寨山铜鼓声律法倾向的初步研究》，见《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58] 同[41]。
- [59] 同[57]。
- [60] 殷玮璋：《从青铜乐钟的类型谈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相关问题》，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 [61] 李纯一：《中国出土上古乐器综论》第277~27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 [62]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小田溪战国墓出有铜甬钟和环钮编钟等乐器，墓主为巴上层贵族甚至王族；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属战国时期，在其所出的1件施镶错纹的铜壶可见编钟和编磬等图案，据分析此铜壶很可能为本地制造，反映的是当时蜀地社会生活。
- [63] 江章华：《关于岷江上游石棺墓的两个问题》，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64] 茂县羌族博物馆等：《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
- [65] 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关系探讨》，《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该文观点是否成立还有待研究，但战国秦汉时期岷江上游与滇池、滇西等地的密切联系在考古学上确实显著。
- [66] 李昆声：《云南艺术史》第104、105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67]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68] 同[60]。
- [69] 蒙文通：《越史丛考》第20、7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 [70] 黄展岳：《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 [7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 [72] 吴钊：《贵县罗泊湾一号墓青铜乐器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见《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88年。
- [73] 吴钊：《广西贵县罗泊湾M1墓青铜乐器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中国音乐》1987年第4期。

（责任编辑 付兵兵）